

克勞塞維茲《戰爭論》之軍事教育觀點

The Military Education Point of View from Clausewitz's "On War"

朱家敏 (Jia-Ming Chu)

專職軍事寫作

提 要

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的《戰爭論》，可說是一部兵學思想的經典之作。其中有許多觀念發人深省，足為軍事教育的藍本。而奧提(T. G. Otte)「克勞塞維茲及其軍事教育」之論述，卻是過去少有人提到《戰爭論》書中所闡釋的軍事教育觀點，的確是一個很新穎的內容創見。

本文之目的乃針對軍事教育提出自己的看法，冀望國防大學軍事教育在政治領域教學之外，亦能重視兵學思想與研究方法之講授，方能開展兵學教育，培養英明的領導幹部，為國所賴。

關鍵詞：戰爭論、軍事教育、質性研究方法

Abstract

Carl Von Clausewitz's "On War" was the most notable work in military theories. There are many ideas and it is thought-provoking enough to serve as an model for military education. T.G. Otte's argument about "Clausewitz and military education" is a single essay on military education of "On War". Nevertheless, it is indeed a novel persp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esent our views for military education, hoping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can not only focus on the political field of pedagogy, but also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military education. Only when we advocate this policy, can we accomplish the goal of military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a wise leadership of whom our country can be dependent upon.

Keywords: "On War", Military Educ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壹、前 言

自從撰寫「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戰爭觀—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兵

學思想之探討」之後，期間雖陸陸續續閱讀相關資料，並於官校100年班三年級暑訓期間，講授過8小時的《戰爭論》課程簡介，即因身體狀況不適，使讀書重點方向朝著「軍

事學術」寫作方法上的研究，遂難以好好讀此本讓人著迷又愛、又讓人困惑的經典名著。《戰爭論》到底是怎樣的一本書呢？如何來讀通，甚而分類撰寫出一個條理清晰，有脈絡可循的學術讀本，俾能對後學有所助益？

事實上，軍事教育永遠是一個國家立國之基，它的教學範疇、方法、策略影響著軍事教育的成敗，關係著戰場勝負，國之興亡。如同前美國海軍中將史坦菲爾·特納(Stansfield Turner)指出，為了以更有效的方式處理戰爭與和平時期千變萬化的情況，軍官必須具備一種反省能力，以便能隨心所欲拋棄偏見，用一種恆常嶄新的觀點，來檢視它所面臨的問題。¹

強調「嶄新的觀點」即如其勉勵海軍戰爭學院的學生所說：「希望在就學的過程中，能激發同學心中的質疑，而這些質疑無法以海岸轟炸或潛艇搜尋模式所用的簡單公式加以解決。如同牛津交付身為哲學家及歷史學者的重任，吾人亦希望能鼓勵同學產生新思維。²」

或許這就是軍事教育的終極目標，強調要在不斷改變的世局變化中，追求美好的戰爭觀念，讓自己觀念能隨著時代的演進，主導戰爭的勝利。換言之，即揭櫫軍事教育所面臨的挑戰，是在戰爭型態變化下，保家衛國萬不可以昨日觀念來應戰。

過去在研讀北伐的戰史，發現到國軍固然擁有空軍，但僅用於偵察之用，卻未發揮

聯合攻擊之效，進行摧毀致命打擊之功，曠日持久，殊為可惜！或許就在於未能前瞻考慮到空軍的演變，已由偵察、協同進化到可以施予致命打擊的角色扮演吧。或許應驗到杜黑：「準備下一場戰爭，需要面對不可知的未來，需要透過心智來想像（構思）、預判未來琢磨、練習。³」貯存於胸的觀念，永遠在影響我們的決策作為。

貳、克勞塞維茲軍事學術研究方法

雖然現今軍事深造教育的課程裡，設計《戰爭論》等兵學思想課程，但我們不得不深切檢討教學的效果有幾？會促使後學願意繼續以「兵學為志業」深究的到底又有多少人？我們可以從國軍軍事刊物來看，近幾年的創作作品少之又少，即可推測前賢的感嘆「現今國防大學軍事教育何止杜黑《制空論》與克勞塞維茲《戰爭論》未講授」有其道理存在。是否在缺乏此等專業師資之傳道、授業、解惑，致使我們的年輕一代軍官極為缺乏兵學概念的素養延伸而運用到國軍軍事事務上呢？假如我們國軍高等教育再不重視此領域的教學，期望塑造出英明將領，將可謂「難於上青天」。拿破崙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說：「將領是不可或缺的，彼係軍隊之首腦，代表全軍。高盧人非敗於羅馬軍團，而敗於凱撒(Julius Caesar)手下。羅馬人不懼迦太基大軍，卻聞漢尼拔(Hannibal)之名而喪膽。攻至維薩及印河者，

1 哈騰朵夫(John B. Hattendorf)著，高一中、郭家琪譯，《「從歷史觀點透視軍事教育的難題」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2007年），頁25。

2 同註1。

3 Giulio Douhet, *The Command of the Air* (Washington, D.C.: Air Force History and Museums Program, 1998), p. 145.

非法國陸軍，而是德爾捏元帥。七年戰爭中面對三國強敵的普魯士，不以普軍為干城，而以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I Von PreuBen)是賴。⁴」培養出國軍英名將校，為國是賴，實乃軍事教育責無旁貸的首要工作。

一、研究基礎

90年的國軍軍事教育改革，推動著軍事院校的軍事課程朝向一個新的里程碑，課程著重「國際關係」的接軌，引領國軍將校具備有國際的素養，認清國際政治現實面，國與國之間只講求利益，伐謀、伐交是戰爭的前提。同時，更開啟軍事學院的「研究方法」講授，期望奠定軍官學術素養，養成能獨立完成有關「建軍備戰」的研究問題。雖然是風光一時的冠冕，但在時間的洗禮下，是否國軍軍事院校能再次檢討，以汰劣存優，符合所需呢？

就拿「研究方法」課程言，究竟有多少學官了然於胸，敢拍胸膛告訴授教說，他懂了，他了解到研究方法相關知識，知道如何去蒐集資料、分類資料、研究資料，甚而按照學術的格式來撰寫一篇符合標準的論文。不要小看此研究方法的延伸，對學術素養的影響性。

早在18世紀末，1770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即指出，「從歷史事件中所推演出來的概念可用以取代親身經驗。⁵」革命是

奠基於高深的學術，而學術的獲得，對於軍人言就是要研究戰史，從戰史的素材裡可以歸納、推衍出戰爭指導概念，有益於建軍備戰。波灣戰爭「空陸一體」新戰爭觀念，是從韓戰、越戰、以阿第三、四次戰爭中研究創新出阻絕作戰的新意，即為明證。⁶

奧提(T. G. Otte)認為，任何一項構築理論的常識性作法，都必須以過去歷史的研究為基礎，而一個人須透過不斷的研究歷史才能賦予其想法適當的形式。這也是克勞塞維茲的觀點，「我們必須極度和仰賴對歷史的研究。⁷」因為，「歷史經驗實為一切知識的來源，所以比任何其他的學術研究都更重要。⁸」

以歷史為基礎的軍事學術研究，真會產生神奇之效果嗎？就以二次大戰美國名將巴頓(George Smith Patton)將軍為例。在1909年春即將從維吉尼亞軍校畢業前夕，於記事簿上記下喜歡的軍事格言、戰爭原則與自己對戰爭的省思。他說：「一個人要想成為偉大的軍人，必須徹底精通所有各種軍事的可能性，無論在任何狀況下，他都要有無比充分的準備。為達到這個目的，必須閱讀最早期、最原始形式的軍事史料，並且以自然順序往下依序閱讀，使他的心智隨著研讀主題共同成長，直到能夠掌握戰爭最精奧的問題為止，而到這個時候，對所有有關戰爭的因

4 James E. Mrazek著，張銘瑛譯，《打勝仗的藝術》（臺北：黎明文化，1986年），頁16。

5 蕭瓦特(Dennis E. Showalter)著，高一中、郭家琪譯，《「寧缺勿濫：談1715至1945年普魯士／德意志軍隊的軍官選拔與教育」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2007年），頁70。

6 詹姆斯·鄧尼根(James F. Dunnigan)、雷蒙·馬塞多尼亞(Raymond M. Macedonia)著，蔡仲章譯，《美國的軍事革新》（臺北：麥田，1996年），頁151-166。

7 奧提(T. G. Otte)著，高一中、郭家琪譯，《「克勞塞維茲及其軍事教育」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2007年），頁38。

8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臺北：麥田出版，1995年），頁253。

素他都應該已經了然於胸」。⁹

此種理念，影響其日後成功的發展深遠。廣泛的閱讀軍事史，對過去戰爭的知識，對各個時代戰場上各種實際問題的熟悉，以及他對歷史上著名指揮官的研究，都使他提升本身的領導才能。在面對決策時，他立即知道所有涉及的選擇途徑，而且可以選擇其中最大膽的作法，因為他知道歷史名將曾經採用這種方法。¹⁰

這說明，軍事學術的根基，應從廣泛研究的軍事史中奠基，不僅可以讓我們擁有正確的戰爭指導概念，更可做為戰爭指導的憑據。克勞塞維茲的觀點，任何政治及戰爭等社會現象的理論要令人信服，都須切合歷史，其主張：「缺乏歷史這項工具，則無由建構起任何理論」。¹¹實有其存在的道理。但是，現今軍事院校教育顯然欠缺軍事史領域的廣泛講授與深耕研究。如果我們不去探究問題面的浮現，就無法提升我們國軍高等教育的素養。不怕問題的出現，只怕我們身居第一線的教職官不敢面對問題的浮現，尋求合理的解決方法，因循苟且，得過且過，那麼形成一代不如一代的軍事素養，也不為過。

二、研究方法

所有研究的起源，都始於古希臘人所稱的方法。一方面是指「通往知識的途徑」，

另一方面則指「對尋求知識漸增的意見」。所以研究方法的意涵，簡單的來說，就是「用來整理分析資料的技術或方法」。¹²其效益在於提供研究者蒐集資料，或深入了解某個特定議題的方法。進一步是，促使其他研究者模仿已經使用過的研究方法，重現前人的努力成果。¹³顯見重視研究方法的運用，是開啟進入知識殿堂的鎖鑰。

學者席諾特(Edimund W. Sinnott)認為學術研究方法可「直接由正面進行」的演繹法：「先行蒐集最多之事實例證，或思想，然後審慎探究各個事實，或思想之間未知關係。如愛迪生從事發明，及愛因斯坦探討學理時採用的方法」。¹⁴或如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的觀點，他說：「有一天，他坐在羅馬古城的廢墟中沉思默想，修道士穿著僧袍，赤著腳在愛神殿內歌頌詩篇。突然，如同雷電光石一般，腦中湧現『羅馬帝國的衰落與敗亡』這部名著的靈感。而此時，全書的章節與內容卻是一片茫然。但是該書中心思想與主旨已經滋生，作者於是蒐集資料，七年之後，完成了這部巨著」。¹⁵這是從一個有興趣（或疑惑）的主題，開始著手蒐集資料來研析。但不論如何，這都指出克勞塞維茲撰寫《戰爭論》的研究方法。

在《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茲生平年表》

9 馬丁·布拉曼生(Martin Blumenson)著，譚天譯，《巴頓將軍—美國的閃擊英雄》（臺北：麥田，1995年），頁64。

10 同註9，頁65。

11 同註7，頁36。

12 Jonathan Grix著，林育珊譯，《TOP研究的必修課—學術研究基礎理論》（臺北：寂天文化，2012年），頁59。

13 同註12，頁61。

14 同註4，頁29。

15 同註4，頁30。

一書中，敘述他參與1793年3月～7月22日的普法美因茲戰爭(Deutsch-Franzosischer Krieg Mainz War)，結果法國戰敗。但克勞塞維茲目睹法軍出城時的狀況，思考為什麼這些由工人、農民、城市商販臨時組成的軍隊敢於與訓練有素的聯軍作戰，而且堅持如此之久？為什麼聯軍整齊方隊和猛烈砲火對付不了這些毫無規則的散兵戰術？更使他不解的是：美因茲本是德國領土，為什麼城中百姓如此擁護外來法軍，與之並肩作戰，甚至許多人隨著法軍隊伍離開自己的家園。

此問題長期懸掛在克氏心頭，經過長期彙整資料，深思戰爭問題的衍生，直到20年（1818年）後撰寫《戰爭論》時才領悟到：1793年的戰爭，出現了人們沒有料想到的情況，戰爭突然成為全民的戰爭。所使用的手段和所能做出努力已經沒有一定界線了，用來進行戰爭的力量再也遇不到任何阻力了。因此，對敵人來說危險也是最大的。¹⁶洞見戰爭型態改變，是由國家、軍隊、人民所參與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可以不關心戰爭，但戰爭卻與你、我有關，我們絕不可置身事外。

如果說，克勞塞維茲的研究方法，是為尋找一個戰爭問題的答案，而窮其一生之力孜孜矻矻鑽研，如此簡要與明確，而完成一部讓後人百讀不厭、讓後人讚嘆不已的《戰爭論》經典之作。是否曉諭我們亦可比照此個案研究方法，¹⁷來從事軍事學術的研究，

來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呢？或許這就是今最遭人詬病之處「乏人問津」的研究方法，零零落落的學術應景報告，只有點的浮現，缺乏線的長度及面的寬度，更少有體的深度展現，這是國軍軍事教育不可輕忽的問題。

參、克勞塞維茲軍事教育觀

克勞塞維茲何以要撰寫《戰爭論》一書呢？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其動機與目的為何？根據《西方戰略思想史》書中所述，克氏撰寫《戰爭論》一書的目的，在於探求「戰爭理論」，此種理論足以反映永恆的戰爭性質，超越一切過去經驗，具有普遍的效力。雖然他自認「對戰爭藝術構成一套科學化理論是一種非常困難的任務。有許多人有此企圖都已經失敗，遂使大多數人都說那是不可能，因為其所考慮的問題無常規可言。¹⁸」然而他抱著化不可能為可能的精神，持續鑽研終斐然有成。

此種針對「戰爭」做一闡釋體系的書，無非是希望所撰寫的書是一本不是兩、三年就會被學者遺忘，而是對此有興趣的人經常翻閱的書。¹⁹也就是說，《戰爭論》的理論解釋，主要是幫助指揮官和從事戰爭的人們確定思考的基本線索，而不應該像路標那樣指出行動的具體道路（其價值性）。²⁰是要撰寫一本傳流於後世，能幫助後學從事戰爭整備的一部有關「戰爭理論」的書籍。為此，今僅針對奧提(T. G. Otte)所論述克氏「

16 薛國安，《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茲》（臺北：倚天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年），頁62-272。

17 是一種透過單一個案完整的分析來了解現象的方法。為能要發掘個案其中的重要特質，發展對其認識，並且為未來更深入的研究展出一些概念，個案研究是最好的選擇。同註12，頁100。

18 同註8，頁258。

19 同註16，頁280-282。

20 同註16，頁288。

軍事教育觀念」提出個人看法。

質性研究發展的重點在於將主題的表達本身視作「研究問題」而予以剖析。換句話說，質性研究²¹要從克氏言談中探究出其對軍事教育的觀點。此種深入探討的論述，即為質性研究敘說（言語）分析的宗旨。

學者奧提儘管在研究《戰爭論》內容範圍受到限制。但在詮釋「軍事教育觀點」研究過程中發現一個異於他人的有趣真相。²²一個與他人不同的思想觀念陳述，卻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克氏的軍事教育觀點如后：

一、軍事教育目標

奧提認為，克勞塞維茲研究「戰爭論」的目的在於「想要全面性了解戰爭的整體現象。」因為透過這些理解，將可使軍事將領以所有的意志及聰明才智，回應戰爭所釋放的力量。對普魯士官員（沙恩霍斯特、格奈澤腦、包恩）等人而言，都非常贊同克勞塞維茲肺腑之言：「教育是一個軍官切實履行責任所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²³

該履行什麼樣的責任呢？想要面對著戰場上千軍萬馬的奔騰、捉對廝殺，並克服所謂的「磨擦」，這實在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所需仰賴的就是將校的領導，能否看出甚而掌握住稍縱即逝的戰機，引領官兵迎接

敵人的挑戰，克服戰爭的磨擦「戰爭是變化不定的，戰爭中四分之三的事務，都籠罩在時稀時濃的不定迷霧裡。所以最要緊的是，我們藉著敏銳的透視力與判斷力察知真實情況。²⁴」如欲從連續不斷的戰火中安然度過，克氏認為須具備兩種條件：「第一，撲朔迷離中，依照腦內靈光指引看清實境的智慧，即要有敏銳的觀察力；第二，在微弱智慧之光引導下前進的勇氣，即指著要有決心。²⁵」兩者具備，才能獲得戰爭上最後勝利。這就是戰爭的目的。

為能達到上述條件，所以克氏說：「教育的目標，是在培養軍事領導技巧淬煉，俾能培養幹部具有成熟的判斷能力。²⁶」即要透過教育的延伸培養出「一般人肉眼一瞥所無法看出來的，或是經過長期反省與檢討方始發現的真知灼見。²⁷」

換言之，軍事作戰能力的養成，所要依賴的就是要不斷的教育，因為：「人類內心若未預先貯存觀念與想法，要有任何心理活動是不可能的；大多數的情況下，這些觀念都不是與生俱來，而是後天習得的，由此構成一個人的知識。²⁸」

「唯有不斷地練習，將例行性訓練內化，才能獲致明快、精確與可靠的領導技

21 質性研究乃是藉由閱讀官書、文件、書籍、錄音帶或觀察與訪問，來蒐集資料，加以分析的程序。胡幼慧，《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臺北：巨流，1996年），頁160。

22 P. Paul Heppner, Mary J. Heppner著，王麗斐等譯，《研究論文寫作：撰寫與投稿的武功秘笈》（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年），頁357。

23 同註7，頁45。

24 同註4，頁35。

25 同註4。

26 同註7，頁55。

27 同註4，頁35。

28 同註7，頁49。

巧。²⁹」正如赫士禮(T.H. Huxley)所指出，所有教育的結果最大的價值便是賦予你處事的能力。³⁰因為，國家以你是賴，「整個戰略之成功及戰術上成功，大半係為將領者一個人智慧的結晶。³¹」

在《為什麼我們這樣生活，那樣工作？》書中提到，作者杜希格(Charles Duhigg)年輕時派駐伊拉克擔任記者，在庫法(Kufa，巴格達以南150公里)小鎮，拜訪過一位美國陸軍少校，他觀察到伊拉克暴民活動的模式是，一群暴民會聚集廣場或寬敞開放空間活動，一聚就好幾小時，然後人數越聚越多，小吃攤販也來湊熱鬧，圍觀的群眾也跟著多。等到有人丟擲石頭或瓶子，場面便開始失控。於是，便和庫法市長晤談，希望市長下令不准小攤販出現在廣場上。市長說沒問題。日後群眾如往昔般的模式開始聚集鬧事。可是每到傍晚，群眾開始喊口號、暴動的同時，肚皮也開始找小攤販，但遍尋不著，群眾便紛紛鳥獸散，到晚上8點左右，廣場上一個人影也不剩。為此，日後庫法未曾爆發過動亂。這名陸軍少校軍官能掌握到習慣的影響，改變習慣後，就能改變作息。是因為在軍旅期間的教育訓練經驗所致，讓少校了解習慣對行為的影響性。因此，在服務庫法服役時，窺出只要小販的集結對群眾所產生暴動行為的影響，不過是形形色色的習

慣使然，彷彿握有手電筒與鐵撬等利器，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³²這顯示出教育所培養出決策領導能力的功效。不正與孫子謀攻篇所說「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³³將帥重要性不謀而合。

二、軍事教育重點

影響戰爭勝利的因素有那些？克氏深信「戰爭只是政治活動的一個分支；不可能獨立存在，由此可以看出問題的關鍵。」因此，唯有將過去的戰爭置於適當的政治背景下，視為一項「政治活動」，「我們才能看清戰爭的本質其實都是相同的」。³⁴戰爭無不是受著政策與利害與共的層面影響，是互盟則利，互離則害。克勞塞維茲在一篇尚未完成研究的「三十年」戰爭文稿中，強調著一個事實「戰爭史是一連串不同時代的連接，反映了當時的人民及其特定風俗及觀念，甚至『國魂』」。³⁵強調著一國的國力是多元性的文物產品，不僅受政治影響，亦受其社會文化、經濟等層面影響。

然而，長久以來研究克氏思想學者心之所繫乃是其對政治方面的觀點。奧提認為克氏對「政治」這個名詞有雙重用法。可分辨為「主觀」與「客觀」政治：前者「指個別的政治人物或政治機構，在特定政治架構中採取的行動或政策」；後者解讀為「純粹是受眾人之託實施管理，俾面對其他國家時

29 同註7，頁54。

30 羅奈爾德 E. 凱斯著，林彩薇譯，《教育及訓練》（臺北：國防部空軍總司令部，2003年），頁5。

31 同註4，頁41。

32 查爾斯·杜希格(Charles Duhigg)著，鍾玉珏、許恬寧譯，《為什麼我們這樣生活，那樣工作？》（臺北：大塊文化，2012年），頁14-15。

33 魏汝霖，《孫子今註今譯》（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年），頁93。

34 同註7，頁42。

35 同註7，頁41。

得以維護其『國家』利益。」因此，克氏將戰爭定義為「政策延續的非常手段」時，係由「國家利益」的清楚概念所主導。想要在戰爭中獲勝，就須「完全掌握國家政策」。在此層次上，「戰略和政策就合而為一，作戰的統帥同時也成為政治家。」為此，政治方針並非僅由政治人物制定，而是對國家利益有一致概念的政治精英來規劃。這對評估克氏「戰爭論」中軍事教育宗旨的人言，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即克勞塞維茲在寫作「戰爭論」的目的不僅是要對新進軍事指揮官給予教育，是要針對未來的軍事指揮官施以戰爭藝術的教育；同時，也在指導政治領袖們，戰爭在做為一項國家政策工具時的本質及限制。³⁶

任何一個決策者都不能漠視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影響國力的四大因素。如同美國政治學家許利璐(Xu Lili)在《國際關係論》中說到，影響一個國家的國力因素有許多，但歸納起來，實為政治、經濟、心理（文化）和軍事等四大要素所形成，這些都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建軍、治軍、備戰與作戰，而此四項國力有彼此相互影響，故國防政策必須與國力相配合。³⁷顯見，克氏認為國家受政策影響的洞見，是現今研讀《戰爭論》不得不重視的一個環節。

就以美軍波灣戰前的廟算為例。美軍吸取越戰教訓，失敗原因除政治干預作戰，贏了戰術輸掉戰略，終導致越共得逞之外，未能得到國際之間的支持，師出無名，致使反戰聲浪高漲，在傷痕累累災情慘重下不得不

撤兵。遂於1991年波灣戰爭前，先行強化國際間之支持，獲得聯合國同意出兵，以100多個國家來對抗形單影隻的伊拉克國家。所以有人說：「波灣戰爭開展並非是美國主導的時代，而是國際合作的新時代」。是師出有名，外加授權史瓦茲柯夫(Herbert Norman Schwarzkopf)將軍全權統帥三軍，並配合著優勢空權，遂能獲得輝煌勝果。³⁸

今臺海兩岸的局勢對比，在軍事上，是敵軍力強大，我軍力未有所殆。如何在政治層面上，挽回我們的頹勢，正考驗著精英的執政團隊，克氏的政治觀點，足可作為明鑑。

三、軍事教育內涵

克氏何以如此重視軍人的武德培育？固然，戰爭是由政府、人民、軍隊三位一體所形成的。但往往赴湯蹈火、前仆後繼、在所不辭的面對生死決戰的第一線，都是由軍人所組成鋼鐵般的隊伍，來捍衛國家的存亡，所以克氏認為：

一支軍隊在最強大的火力之下，仍能維持其正常隊形不變，那是不為想像的恐懼所動搖，在面臨著真正危險時仍能寸土必爭的苦撐，對於勝利一事感到驕傲，但從不喪失其服從意識，甚至於在失敗的重大打擊之下，也不改變對其領袖們的尊敬和信仰；一支軍隊包括所有人員的體力在內，像運動員的肌肉一樣，都是經由練習而慣於接受辛勞和疲勞；一支軍隊認為一切苦勞是換取勝利的工具，所以無論如何困難都毫無怨言，經常憑榮譽心來提醒自己不得玩忽職守——這樣

36 同註7，頁44-45。

37 蔣緯國，《軍制基本原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頁84。

38 布萊恩·史提得(Brain Sreed)著，陳孝燮譯，《武裝衝突現代戰爭的啟示》（臺北：國防部，2006年），頁38。

的軍隊才算已經充滿了真正的軍事精神（即具備著武德）。³⁹

唯能具備此種武德特質，才堪勝任軍人所賦予的職責所在，為國盡忠，馬革裹屍，戰死疆場不為惜。但要如何才能使將校官兵具備此種與眾不同的特質呢？

在此，奧提提出他的觀點，發現克氏對戰爭研究的概念性處理手法是以理論（概念）與實務（戰史事例）為基礎。所以他的教育概念便是以「心智」（人類內在本具有的行動力）及「教化」（對類似能力的琢磨淬煉過程）為本。即「天才的行事是最佳原則（心智），理論（教化）卻只能讓我們知道該如何進行，及為何該如此進行。」⁴⁰

為達到此教育目標，克氏將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尤其康德的美學判斷中盛行的天才觀念，運用於戰爭上。不僅如此，更強調必須將戰爭本具有的理解與智識研究及反省相結合。若能做到此點，就能建立起軍事領袖所必須具備的「機敏判斷力」。⁴¹理論性研究及批判性分析所扮演角色，「只不過是行動前的深思熟慮罷了」。⁴²此乃將校該具備著指揮作戰的能力特質。

換句話說，奧提的觀點認為，克氏的戰爭理論，將預測行動的形式，轉換成一種有系統的概念，能幫助軍事指揮官有效準備戰爭，但最終目的仍然是指揮官的意志及能力，能將戰爭理論（從戰略作戰）轉化為實

際行動工具的（實務的戰術執行作戰）。對理論家言，上述這點需要激發其責任感，無止盡的把戰爭分析向前推衍；他們越能把抗拒指揮官意志的衝突力量概念化，指揮官越能對戰爭的真實面做好萬全的準備。⁴³

奧提在閱讀中提出他的發現，認為從理論與戰爭中由意志推動的行動中，衍生出兩點推論。首先，果決行動的假想優先順序指引理論本身。鑑於戰爭中所有行動通常都充滿不確定性，克氏認為：「有時候大無畏的勇氣是最高智慧。」其次，理論的主要重點從傳統的手段與目的評估，轉化為「精神分析」，亦即士氣、動機，即面對困境時人格及意志的強度。⁴⁴不得不如此轉化成一種決斷果敢的能力（勇敢、敏捷、忍耐與熱心等特質能力），⁴⁵是因為「戰爭起源於戰爭爆發時所存在的各種思想、觀念和關係，因此而使戰爭有種種形態」。⁴⁶

克氏在研究戰爭理論中，很早就認清「道德因素」的重大意義，其本身就能對戰爭中無預警的衝突提供必要的檢驗。就戰爭中衝突言，根本沒有證明有效的處理方式或規則可循。唯一能仰賴的只有指揮官的人格特質及意志力，二者共同作用產生決斷力（即面對困境能以閃電的速度發揮果敢的判斷力，這是一種英雄式的高度指揮標記。如巴頓二次大戰於1944年12月22日～12月26日，解圍巴斯通危機，瓦解德軍企圖佔領安特

39 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著，鈕先鍾，《戰爭論精華》（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頁131。

40 同註7，頁45。

41 同註7。

42 同註7，頁46。

43 同註7。

44 同註7。

45 同註39，頁132-135。

46 福煦(Ferdinand Foch)著，趙念渝等譯，《作戰原則》（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年9月），頁21。

衛普港，切斷盟軍突出部之役的補給⁴⁷），克氏將此定義為依據個人分析採取行動的勇氣。

由於這種精神力量原本就是根植於人性中，因此克氏的戰爭理論，大體訴求是軍事領袖人格內在的精神核心：「只有靠足以主宰像絕對獨裁者般強人的意志力，才能避免內在獨特天份及能力散逸。」對克氏言，個人精神的自由及內在的自主權，是所有戰爭行為的先決條件。只有這些條件能保證智識的清晰，使指揮官得以獨立決斷和行動。⁴⁸就以巴頓突出部之役言，早在1944年12月9日，第三軍團即已觀察出德軍下一步可能的企圖，而早做準備應變計畫。所以當面對危機的出現，包括艾森豪統帥等多位將領，都束手無策，19日會議中問巴頓什麼時候可出兵解圍。巴頓說22日即可調動25萬大部分兵力由原本朝東向攻擊，轉90度向北發動奇襲。令所有在場官兵不可置信。迅速果決的周密計畫，如石破天驚，順利解救在巴斯通(Bastogne)被圍美軍。⁴⁹

巴頓將軍此種勇於任事冒險犯難，不怕死的大無畏勇氣特質。克氏在《戰爭論》中即極為讚許，他說：「一個軍人無論只是小鼓手或貴為將領，所能具備最高貴的特質莫過於勇氣；勇氣使得手中的劍更鋒利、更光芒懾人。戰爭中的勇氣有其特殊優勢。只要比敵人更無畏，敵人聞風喪膽，便暴露其弱點，可以乘瑕抵隙、占其上風。換言之，勇氣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創造力。」然而，克氏

自身的經驗及理論推衍出的結論，使他也認為：「領導層級越高，就越需要基於省思能力的膽識和勇氣。」否則，英勇的行動很容易淪為漫無方向、暴虎馮河的激情。確實，克氏警告過「指揮官的大膽行動，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鑄成大錯」。⁵⁰

克氏就以1806年耶拿戰役(Battle of Jena-Auerstedt)慘敗的普魯士王子斐迪南(Charles II Willian Ferdinand)為例，說道：「果不出所料，其高估了自己無畏行為的效用；妄圖達成不可能的任務。由於用勇氣而非智識抗拒，其終被需求的鐵律打敗。⁵¹」二次大戰最讓人詬病蒙哥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 1st Viscount Montgomery of Alamein)所主導的「市場花園作戰(Operation Market Garden)」失敗，這些殷鑑足資警惕。

可是克氏又承認，如果思想主導一切，可能會削弱大無畏的成分。由此他指出：「膽識越到高層越難得一見，軍階越高，則行動越為思想、理智、洞見所主導。」正因為這個理由，所以如果在指揮官身上還能看到膽識，毋寧是件受歡迎的好事。因為「一位出色但膽子不大的指揮官，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他認為「膽識可以使智識及見解如虎添翼、更為突出。翅膀越強壯、高度就越高、就飛的越廣、成效已就更佳。」基於這些心智的觀察所得，克氏再次提出軍人武德中精神的訴求。

由過人智識所主導的膽識是英雄的印記。這種膽識不會違背或然率，而是一種支

47 同註9，頁268-274。

48 同註7，頁46。

49 同註9，頁268-272。

50 同註7，頁48。

51 同註7。

持更高形式分析的充沛精力，天才藉由機敏的判斷力達成快速的決定，且只有部分或然率的意識考量。⁵²

由此可見，就克氏言，軍事天才的概念非但指出須具備勇氣，更指著是要有高度純熟的智識。⁵³ 此種純熟的智識，即克氏的觀點：智力的活動屬於一種廣義的藝術，是依嚴格邏輯推斷，比較一切數值，篩選出最貼切而適當的途徑。⁵⁴ 也就是巴頓所說的話，「經過戰爭的活動，用鮮血才能證明他自己辛苦學來的知識技能沒有白費。」在「殺敵才能贏得戰爭」的前提下，「戰爭是要靠冒險才能打勝的」。⁵⁵ 當機立斷的知識，勇於接受危機挑戰的膽識，實乃軍人武德的特質。

四、軍事教育方法

奧提不僅認為克氏重視軍事「戰爭理論」教育，但更重視師資教育所扮演的角色，其主要的挑戰不在灌輸事實性的知識，而在教育學生的心智，「引導學生自我教育，而非伴隨其共赴戰場。」一個有智慧的戰爭研究老師「必須引導及激發青年學生的智識發展，但須注意避免終生呵護照料。」也就是說，克氏堅信軍事教育需要的不是填充式教學；而是創造價值及信念，以為戰爭中行動的基礎：

假如理論家的研究自動衍生出原理與規

則，假如真理會自然而然的形成這些原理與規則，那麼理論不會抗拒心智的自然傾向。相反的，真理的拱門會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基石上，這種傾向終會突顯。但這樣的說法只是單純根據科學推論法則，指出所有線索匯聚的一點，並非建立出一套戰場上能使用代數的公式。⁵⁶ 反之，類似的原理與規則，會像準則般在軍事衝突當中襄助指揮官採取行動，但不會具體指出何者才是「正確」的行動。⁵⁷

何以戰爭理論無法指出「正確」的行動？如同李德哈特在《為何不向歷史學習》書中提到，歷史作為一個「指標」(guiding signpost)，其用途是有限制的，因為它雖然能指示我們以正確的方向，但卻不能對道路情況提供明細的資料。但作為一個「警告牌」(warning sign)的消極價值卻是比較確定。歷史可以指示我們應該「避免」(avoid)，即令它並不能教導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它所用的方法即指出人類所易於造成和重犯的某些最普通的錯誤。⁵⁸ 歷史經驗僅能警告，但無法明確告知如何做才是正確的行徑，與克氏之言有異曲同工之妙。

何以戰爭理論（歷史經驗）無法提供出正確的途徑呢？克勞塞維茲將戰爭的行動比喻為：「所有的行動，都發生在一種朦朧模糊的狀態之中，像霧又像月光籠罩，通常

52 同註7。

53 同註7，頁49。

54 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著，王洽南譯，《戰爭論》（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1年3月），頁669。

55 同註9，頁178-181。

56 同註7，頁52。

57 同註7，頁53。

58 李德哈特(B.H.Liddell Hart)著，鈕先鍾譯，《為何不向歷史學習》（臺北：軍事譯粹社，1981年6月），頁15。

會使事物看來怪異，甚至比他們尋常的樣子更巨大。」因此，戰爭是屬於「不確定的領域，戰爭中行動所根據的要素，有四分之三是裹在一團或多或少不確定的迷霧當中」。⁵⁹為此，所有行動準則最終都有缺陷。又指出：「在政治領域中沒有確定性可言；因此人必須退而求其次，滿足或多或少的可能性」。⁶⁰

克勞塞維茲認為，對於戰爭理論的研究與了解，如果僅「淪為一種理論的機械式運用」，那麼理論將沒有什麼實際的用處。以理論為基礎的深刻見解適不適用，完全得視特定案例的情況而定。換言之，他所提供的「理論」只能作為思考之用，「是判斷的輔助工具」。⁶¹這明確指出，閱讀戰爭論的最大獲益之處，在於培養出敏銳、寬廣的思考角度，幫忙我們選擇出正確的行徑。就像身邊擁有一位傳道、授業、解惑導師，亞歷山大之所以能成其大，乃是因為身旁有亞歷士多德名師啟發其心智所致。⁶²

其所說的教育意涵為何？蘭伯特(Andrew Lambert)在「歷史是種過程與記錄」的文章論述到他對「教育」觀點說：

教育不同於訓練。其宗旨在協助我們學習如何培養觀察力、價值觀及能力，以因應事務的變化、革新與不確定性。從事教育者不可妄稱其具備「答案」。他們可以挑戰與

激發思想，但若其意圖提供答案，則只不過是填鴨而已，而非從事教育。⁶³

顯然皆說出教育著重在講授中使受教者明於心而能「靈活運用」。不正就指出軍事教育必須重視師資詮釋的講授，方能開啟受教者心靈，引領進入戰爭的藝術領域。可是仔細檢討現今國軍軍事教育的現況，或許我們可以美國空軍大學戰爭學院退休教授休斯(Daniel J. Hughes)評論軍事教育疏失的環節所說。

美國空軍專業軍事教育，已乏善可陳。因為它的主要教育機構，都是由那些學術背景淺薄甚至全無的高官所把持。這些院校教員隊伍中的軍職教員，說客氣些是無法承擔教學這一行，更露骨的說是公然敵視學術。同時，所強調專業學術，是指入學學員們缺乏：適當了解史學或理論對其未來有所裨益，有助於他們更深刻的理解自己的軍事專業，並能做出更明智的決策。⁶⁴

此說出，現今中外皆然，缺乏一流的兵學素養師資，而無法重視基礎兵學素養的講授。若此，怎可能奠下國軍官兵兵學素養，有利日後建軍備戰呢？於是詹姆斯(James)與理查(Richard)兩位作者，即大聲呼籲，若想要強調「兵學素養」，「兵學思想」紙本的宣導與講授，乃為首要。他們認為：

「書籍一直以來都是高等教育的支柱。

59 同註7，頁43。

60 同註7。

61 同註7，頁43-44。

62 同註4，頁42-43。

63 蘭伯特(Andrew Lambert)著，高一中、郭家琪譯，《「歷史是種過程與記錄：論皇家海軍與軍教育」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2007年），頁144。

64 詹姆斯·W·小福西斯博士(Dr. James W. Forsyth Jr.)、理查德·R·穆勒博士(Dr. Richard. Muller)，〈我們也曾經做過教務長……也曾經年輕—資深教官談專業軍事教育體會〉，《空中力量雜誌》，2011年冬季刊，頁85-86。

」「從閱讀中，領會作者觀點，論述的證據，並參照個人經驗與文獻資料，這才是教育的精髓。」「並且透過閱讀好書，才能寫出好的文章。因撰寫研究論文是智力發展的重要部分，它能培養學員終身受益的良好思維習慣和探索模式。⁶⁵」

國內學者易君博說的好：「歷史研究，是以描述事實（是什麼）及建立事實與事實之間的因果，讓讀者一目了然勝負經過與其結果的關連影響性為目的。⁶⁶」正指出，講授或閱讀克氏《戰爭論》紙本的目的，就是建立起戰爭指導觀念的因果關係建立。這不就是克氏撰寫《戰爭論》的本意嗎。只是熟稔者幾何？是否該加強軍事師資的素養？否則外行如何能精闡闡釋《戰爭論》旨意，引領學者窺其精髓而運用到戰場呢？

五、軍事教育特點

（一）提供正確的戰爭觀念

克勞塞維茲曾說，軍事知識和理論都有其價值。理論是以規律和原則為基礎，並能對於古今名將的成功提供解釋。假使僅憑經驗即能提供足夠的訓練，則老士官也都可以做將軍。⁶⁷戰爭的正確觀念養成，不是僅靠經驗的累積，更要靠的是教育的啟蒙，來開啟我們的智慧。名傳記家蒲魯塔克(Plutarch)敘述亞歷山大的特質：「他求知若渴，學習的熱情與時俱增。喜愛各種讀物，行軍或者激戰終日後，秉燭夜讀至深夜，以與前輩科學家、學者會談為樂。」而杜立特

(Will Durant)更進一步說：「他醉心於戰爭與政治」。⁶⁸這說出成就亞歷山大的豐功偉業的英名，來自於他勤敏博學，更專精於戰爭理論的閱讀，從中汲取正確的戰爭觀念，遂能在征戰波斯，面對大流士(Darayavaus)的60萬甚而百萬的優勢兵力，能以弱擊眾，屢戰屢勝。⁶⁹

何以軍事（戰爭）理論是如此重要？其根據元素為何？克勞塞維茲認為，軍事理論能提供「正確的戰爭觀念」，而此種觀念又是以「事物的性質或經驗」為基礎。所以，理論與現實之間存在著一種固有的互賴關係。⁷⁰從戰爭實體的過程，產生種求好心切的為下一場求勝觀念，衍生出戰爭的規範或原則。

奧提在研究克氏對「論戰爭理論的條件」認為，其著作是對舊有的戰爭理論作出下述的總結：「缺乏哲學精神，最終常是不知所云的惡劣整體建構，各原理及規則欠缺充分的辯解，觀點瑣碎不全，極盡迂腐之能事。」事實上是，「戰爭的理論，不僅是把個別的（事物性）經驗串聯在一起，而必須具備『推論』，亦即下結論，並從經驗中推演出新原則。」他堅信這般的作法，唯有以正確形式表達才能具有說服力。他指出：「形式和實質是『邏輯的基本概念，每個受教育的人都知道，形式真理』是所有真理的『必要條件』，而且只能以正確的形式存在。邏輯的法則如果無法正確的運用，而且在結合個別

65 同註64，頁89-90。

66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12月），頁169。

67 同註8，頁240。

68 同註4，頁43。

69 同註4，頁44。

70 同註8，頁240。

要素時枉顧了形式，那麼人人都能了解其個別要素，但對整個概念卻無法理解。⁷¹」

克氏嘗試釐清真理的概念，以及克服先前戰爭理論的缺失。將真理分為「形式真理」及「實質的真理」，並指出「真理的特性，就是不隨主體變化。」同時說明：「實質真理」描述的是「主體」和「概念」的對應；相較之下，「形式真理」描述的則是「一個概念」與「邏輯法則」對應的程度。進一步指出，這些道理對任何人言都是一體適用，邏輯真理對所有人而言，也必定是真理。因此，他主張：「戰爭藝術的理論中產生所有概念及觀點，只要沒有違反實質或邏輯真理，都必須受到所有研究者的肯定；而且各種概念和觀點間有必要取得一致的認同。」當「這種認同越深，人們就越能充分表達這項理論」。⁷²

這說出克氏期許自己從戰史的演繹、歸納出來的戰爭理論，不僅具有形式上更具有實質真理影響，希望能得到廣大讀者群的認同，更甚者能影響到國家的戰爭指導，作為將帥領導的依據規範。

實則上，克氏戰爭理論的核心是「理論與實務的問題」。⁷³就此而言，從克氏的手稿當中，我們可以擷取兩個有關其方法論的重要洞見。首先，克氏極為重視「用詞精準」及「立論簡潔」；其次，他確定「分析」

與「論證」的方式必須正確，也就是說，在我們系統化闡釋理論的過程中，「形式」和「實質」真理必須能夠前後呼應。亦即，一個理論越正確，就越能貼近現實。⁷⁴為此，克氏進一步指出，他所提供的理論只能做為思考之用，不能成為基準規範之論點；只能讓指揮官在戰爭前，透過研究及精確的智識活動，對戰爭大致有所準備。⁷⁵即「理論」只能作思考之用，是「判斷的輔助工具」。⁷⁶

換言之，要了解戰爭首先需要明確的「觀念」和「原則」，這樣始能澄清戰爭中部分與全體之間連繫。這些「觀念」必須以「事物的性質為基礎」，若無這些「觀念」和「原則」，則就無知識可言。其次，必須了解這些「觀念」和「原則」在行動中的實際運作，因為僅憑理性不足以發展現實。「觀念」和「原則」對現實的運用需要判斷，而又只有經驗和時常練習始能磨練判斷力，其主要工具即為「歷史研究」。教育年輕軍官最適當的方法為，首先向他們提供「正確理論」（戰爭論等書闡釋的戰爭概念），然後再鼓勵獨立思考，並澄清其觀念。這也就能對經驗的分析創造一種健全的基礎。⁷⁷孫子始計篇「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⁷⁸實有其道理的存在。

(二)培養出實戰的能力

克勞塞維茲在《戰爭論》手稿中說

71 同註7，頁37。

72 同註7，頁38。

73 同註7，頁38。

74 同註7。

75 同註7，頁44。

76 同註7，頁44。

77 同註8，頁240。

78 同註33，頁72。

過，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嘗試探究戰爭的現象，這些現象及其組成要素間的聯接。不迴避任何合乎邏輯的結論，但每當證據太薄弱時，克氏即會暫時中斷研究，回顧與經驗相關的現象。正如某些植物只有保持低姿態才能結出果實一般，在實際的兵法藝術中，理論的枝葉與花朵必須經過修剪，如植物適度接近其根本的土壤（經驗），才能開花結果。⁷⁹」

缺乏經驗的理論不合實際，是過於抽象不為人所理解而發揮於戰場上；同理，應用於經驗的理論，才能開花結果，才能戰場上發揮功能價值。克氏認為現實抽象概念的理論，有必要儘可能接近事實，故戰爭須被視為一項「實際的藝術」。所有的理論也必須基於歷史上發生過的事實：「越思索『戰爭的原理』，就越相信理論無法公式化闡述抽象的格言；並非由於事情太複雜，而是一位對細節過份鑽研考究，反而容易為瑣碎的細節所羈絆。⁸⁰」

這指出，思考戰爭的原理，若缺乏實務的經驗，往往會與現實脫節，而輸掉一場戰爭。二次大戰前，蘇聯國防人民委員弗羅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指斥帝國主義將賭注押在空軍身上，認為杜黑理論是完全站不住腳的。⁸¹ 蘇聯遂未重視空軍的建軍備戰，僅將其視為陸、海軍的輔助角色，造成二次大戰初期的失利。史達林於1941年11

月6日，在總結德、蘇初期戰爭檢討「暫時失利的因素」時指出「是航空兵力量有些不足」；1941年11月12日，在給朱可夫(Georgy Zhukov)電報中說到：「對德作戰經驗表明，只有掌握制空權，才可能取得戰爭勝利」。⁸² 此種輕忽空軍角色的災難，是來自於決策者戰爭指導的觀念—海、陸為主，空軍為輔。與實際戰爭發展運用的狀況—空軍為主，海、陸軍為輔是有很大的差別的，遂導致戰爭初期的失利。

但想從戰爭指導到戰爭結束的每一個步驟，都能面面俱到考慮周延，那簡直是天方夜譚。當如孫子始計篇之言「廟算勝，少算不勝，何況不算乎？」只求其多數因素掌握即可。所以貝倫霍斯特(Georg Heinrich von Berenhorst)在《戰爭藝術的省思》中說：「戰爭藝術並非以不變法則為基礎，而與許多未知而無法控制的因素有關，並是在充滿意志力和感情的環境運作。⁸³」戰爭實在充滿著許多未知的變數因素。如何能掌握住理論的引導與汲取實戰接敵的經驗，往往決定戰場的勝敗之舉。英國海軍教官約翰·羅頓(John Knox Laughton)說的好，「歷史不只是研究戰術、戰略、組織與紀律的基礎，而且也從事此等研究的唯一當然基礎。⁸⁴」對一位軍人言，重視歷史的研讀，往往能奠其專業素養的根基。這都指出一切的戰爭指導的「答案就應向書本尋找。⁸⁵」

79 同註7，頁40。

80 同註7。

81 董文先、胡思遠，《杜黑理論與空軍》（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頁2。

82 同註81，頁42。

83 同註8，頁238。

84 同註63，頁154。

85 Eliot A. Cohen & John Gooch著，鈕先鍾譯，《軍事災難—戰爭失敗之剖析》（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5年9月），頁286。

克氏《戰爭論》著作極為重視所依據的戰爭經驗。如帕里(Peret)之言，不僅是他自己及他那一代人的經驗，但同時更傳達出「唯有歷史才能傳達」的經驗。研究過去的歷史，不僅能增加經驗數據的總數，更能讓人跨越時空、做長期性普遍的概括歸納，進而找出可能放諸四海皆準的共通概念。研究歷史的唯一目標，就是使來者能不受時空環境的影響與限制，對戰爭永恆不變的真實面貌，產生廣泛全面的深刻洞見。要能做到這點，先決條件便是歷史學者必須客觀。確立軍事史成為現代學科的歷史學家德爾呂布克(Hans Delbruck)，就曾讚美克勞塞維茲的心智「如此適合歷史知性的要求。⁸⁶」由此可見，軍事教育專業素養的養成教育，必賴擁有豐富的軍事史知識。尤其學者艾克·思凱爾頓更說：「未來軍事領導者其專業教育上須以歷史作為基礎⁸⁷」實值得惕勵。

(三)強化哲學邏輯素養的薰陶，以贏得戰爭中不朽聲譽

吳錦勳在「越寫，越聰明！」的文章說到：「磨筆也能磨出未來領袖的腦袋。⁸⁸」或許這可說是克勞塞維茲的一生寫照。勤敏於學，更努力將所參與的軍旅生涯過程，自己對戰爭的看法，寫出來，而流傳後世的文本效益，非他生前所能想像。成就其一生的偉業，更盼望能教育後起之秀，成為軍中

優質幹部，磨出領袖的腦袋。在拜讀之際，瞻仰其人風采，會思考一個問題：學者對其研究方法持有什麼觀點呢？

就以《如何寫歷史》書中所言，「歷史，包括了資料—證據、人名與地名、事物發生的時間、事物發生的地點，和從許多資料蒐集來的各種資訊。同時，歷史包括過去學者專家與其他人的詮釋，撰寫歷史在處理主題時，也同時要處理他們的看法。所以歷史的藝術，在於結合事實與詮釋以講述一段有關過去的故事。⁸⁹」指出要講述一段克氏撰寫《戰爭論》的故事，莫忘學者對他研究觀點看法。

在研究過程中，必須先認知「我們對這個世界是如何構成的，以及社會情境中最重要的成分，都有自己的看法。⁹⁰」同一件事物，會因切入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論述。所以看法人言殊異，因此學者專家提醒我們，要認知到「本體論中的確有各種不同的觀點（對戰爭論研究的觀點），而這些不同的觀點都可能產生不同的研究結果—有此體認，才能夠開始與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產生連接。⁹¹」

奧提對此提出論述認為，克氏對歷史研究的方法論，本質上是描述性的。其目標是以歷史的各種表現形式來檢驗戰爭的現象。今日，研究克氏的後學往往為其著作龐

86 同註7，頁40。

87 道格拉斯·強森編，余忠勇譯，《未來的領導統御老議題及新方法》（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2年），頁93。

88 吳錦勳，〈越寫，越聰明！〉，《商業周刊第1012期》，2007年4月11日，〈<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webarticle.php?id=26133&p=1-8>〉（檢索日期：2014年8月12日）。

89 理查·馬里厄斯(Richard Marius)、梅爾文·佩吉(Mil. Page)著，黃煜文譯，《如何寫歷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頁14-15。

90 同註12，頁115。

91 同註12。

大篇幅及錯綜複雜的結構所嚇到，以致忽略了克氏編纂的近130多個的歷史。從中古戰爭的各種面向到1815年法國歐洲的反法戰爭，這些戰役為克氏日後的理論綜合提供了堅實的經驗數據。這些研究跨越的年代之廣，再次突顯了一個事實：「克氏一點也不是如外界所認為，完全著眼於拿破崙時期現代戰爭的發展；事實上，他對早期戰役的強調，反而突顯他的動機在於打破拿破崙時期戰爭的模式，以更全面的觀察戰爭做為一種社會現象的本質。」⁹²

更甚者，克氏的歷史處理手法也使得他能更有效的駁斥18世紀流行的機械化戰爭理論；這種理論認為戰爭的一般原理和法則，可以用更幾何方式來闡述。對早期這些嘗試建構純粹軍事思想體系的作法，克氏毫不留情地加以嚴苛批評（坊間欠缺此方面資料）。對他而言，這些理論內在的邏輯缺乏連貫性，無法有效連接戰爭的真實面。到頭來，持機械化戰爭理論者，主要只是在做推論演繹，其理論極端賣弄學問之能事，而「某些人更是拿軍人當作兒戲」。⁹³ 是否說出過去決策對戰爭的看法，在無所憑據的指導下，說了就算的困惑與迷失，甚而引起無謂的犧牲，而引來敗戰之辱呢？近觀英阿福島之戰，阿軍缺乏防禦的策略與戰術指導。初起不認為英國會為阿軍占領福島而出兵挑起戰爭；繼之，未將其空權自其內陸移至福島

而敗戰。⁹⁴ 或許就是克氏所言的悲劇吧。

因此，克氏反對戰爭研究可以仿效工程等機械科學，或與藝術等量齊觀的說法。反之，克氏採「歸納」的方式，從人性的具體素材一步步歸納到戰爭的抽象理論。其指出：

戰爭並不屬於藝術或科學的領域，而是人類在社會群居生存的一部分。戰爭是人類以流血來解決重大利益衝突。戰爭並非如同工藝一般，對無生命事物行使的意志，也非如同藝術一般，對人類的精神和感情這一類有生命但消極順從的事物行使意志。在戰爭當中，人類是對有生命且會做出反應的物體行使意志。⁹⁵

為此，克氏從戰爭互動不歇的特質中指出，戰爭結果往往不是絕對的。因為「戰敗國家往往會把戰敗看成一時之災難，而將來仍可利用政治情勢予以挽救」。⁹⁶ 克氏時期普法紛爭不斷的戰爭，及現今以阿對峙的局勢未解，就是最好的註解。

會有此邏輯的推論與演繹，或許就是克氏的特長，將史學家和哲學家的方法合而為一，他以觀察為基礎而進至演繹，他認為此種方法可以保證其原則的正確，此即為戰爭論的最重要特徵。⁹⁷

克勞塞維茲如何從現實的戰爭基礎上（經驗—歷史—土壤），演繹出（哲學—一套戰爭觀念，即他所說綻放出美麗花朵）《

92 同註7，頁39。

93 同註7。

94 Bruce W. Watson、Peter M. Dunn著，劉陽先譯，《福島戰爭的軍事教訓》（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7月），頁120-121。

95 同註7，頁39。

96 同註54，頁8。

97 同註39，頁25。

戰爭論》的戰爭概念。奧提認為克氏完全是受教於哲學影響所致。

克氏最早的成就是以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發展出的分析方式，來研究國與國之間的武裝衝突。雖然難以界定任何當代的哲學家對他有直接的影響，但克氏思想確實穩固的深植於後康德時期的德國哲學思想的詮釋學傳統。如羅德費斯所言，類似觀念的興起，彼此不一定有所關連，可能只是先後獨立出現。然而，大多數研究克氏的學者都同意，克氏像他那個時代多數的普魯士改革者一樣，對先進的哲學思想具有強烈的喜好。而在這方面，克氏追隨的是他的導師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沙氏本身對理論及實務問題相當感興趣。再者，克氏於中尉1801~1804年間，在柏林由沙氏創辦的陸軍官校上過邏輯及數學，是人盡皆知的事實。

當時為他講授這些課程的老師是偉大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弟子之一，基斯維特(Johnn Gottfried Kieseewetter)。他雖然可能並非一位原創性的思想家，卻是一位技巧嫻熟的教師，同時成功的傳播了康德的思想。正如哈威格(Werner Hahlweg)所說，克氏曾使用基斯維特所著，有關康德邏輯的指南進行研究，尤其著眼於理論及實務問題的解決。

事實上，克氏在他活動的社會及智識環境中獲得許多啟發。他似乎真的跟哲學家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德國古典哲

學家的重要代表。)及新教神學家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Daniel Schleiermacher；德國神學家、傳教家、古典語言家。是古典解釋學的創始人、德國著名的柏拉圖專家。)有不錯的私誼，三人同屬於柏林一個知識份子愛國團體「道德團」(Tugendum)。不管這些外在影響的程度如何，最終克氏仍藉由有條不紊的精確思考，將這些想法形塑成原創的一套體系。⁹⁸

基於此是一套詳盡戰爭系統觀點，所以法國於1870年慘敗之後，即開始學習征服者的方法，以德國為師。1886年《戰爭論》的法文譯本出版，法國人才明瞭德國戰略之所以能獲勝就是因為那是以克勞塞維茲《戰爭論》思想為基礎。而法國福煦元帥也是克勞塞維茲的私塾弟子。⁹⁹英國戰略家何華德(Michael Howard)對克氏非常讚譽「克勞塞維茲所著《戰爭論》在多年後仍為一本基本教科書。¹⁰⁰」是值得對戰爭有興趣的後學，一再把玩閱讀的經典好書。

克氏認為，「蒐集資料的過程本身並非終極目的。研究之終極活動是分析、詮釋以及呈現發現的結果。¹⁰¹」或許也指出克氏在研究過程中，最辛苦的階段莫若資料的蒐集。如同學者專家告訴我們「儘可能對主題的初步搜尋工作做得越廣泛越好。提醒你總要找出比論文所需更多的資訊。¹⁰²」如此在做結論收尾時，我們才會有更多時間來進行篩選資料，做最精確的推論。這就是克氏《

98 同註7，頁36-37。

99 同註39，頁48。

100 同註39，頁18。

101 米高·奎因·巴頓(Michael Quinn Patton)著，吳芝儀、李奉儒譯，《質的評鑑與研究》(臺北：桂冠，1995年)，頁372。

102 同註89，頁81。

戰爭論》之精要之處。

我們在軍事教學或研讀《戰爭論》的過程中，亟需學習克氏哲學邏輯推理的能力，以取法來建構屬於自己的戰爭藝術的能力。誠如孫子虛實篇所述：「兵形象水…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為之神。」¹⁰³ 俾贏得下次戰爭中不朽聲譽。

肆、克勞塞維茲軍事教育的運用

加拿大摩頓(Robert W. Morton)中將曾說過：「軍官必須接受良好的訓練與教育以精通戰爭藝術，才能有優異的表現。扎實的軍事技能極為重要，具有創造性思維和嚴謹的分析能力也同樣重要。軍官必須廣泛了解可能會影響國家安全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軍事議題和趨勢，俾能無負國家之所託。¹⁰⁴」指出現今的軍事教育不僅要著重戰術技能的運用，更要強調軍事教育目標的方向，所需要通才與專精的領域不可缺一。非但以軍事為首要，更要通曉相關政治、文化、社會等議題為要。這不正指出克氏《戰爭論》內涵的精髓嗎？1815年11月8日，「總瑞士軍事報」刊登篇評論說：「克勞塞維茲堪稱為當代第一位軍事著作家。閱讀其書者，無不證明他們在他的書中曾發現了異常豐富的智識泉源。¹⁰⁵」如何來發覺此種有益戰爭準備以贏得戰爭勝利的軍事教育知識呢？個人在研讀中，認為若能朝向下述觀點來進行，當能發揮其軍事教育的極致。

一、兵學理論研析與講授

或許在軍中服務的年資多半是在軍事教學生涯度過快樂的軍旅生活，尤其養成對史編局所譯註的軍事叢書愛不釋手，更想珍藏、玩味。退休之後，更將閱讀軍事史籍作為自己唯一的休閒最愛，當再次閱讀到《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一書，其中一篇論述克勞塞維茲的「軍事教育觀」頗有著墨，在品讀之下，發現到竟是一篇擷取克氏對「軍事教育觀點」條理清晰的與眾不同的研究發現。這不正是篇創作嗎？若拿現今軍事刊物所刊登的宗旨，在欠缺相對（與孫子或與李德哈特等軍事學家）比較之下的陳述，都不會認為是篇好的文章。

但是，事實上美國藝術家曼·雷(Man Ray)曾說過一句很值得我們從事教學警惕的格言：「創作者只需要一名愛好者就足夠。¹⁰⁶」一篇創作的文稿，僅要是寫你所好的、而有新的見解觀點，就是篇好的創作。是因為我們在沉浸其中的過程中，比旁人花上更多的時間，發現前人所未見，而見微知著，提出自己的感觸，野人獻曝亦有其新解，這就是創作。何況是依據質性研究學的觀點，「分析能使研究者最終明白，什麼才是最重要的研究對象，卻是他們事先無法知道的。分析所帶來的，是當發現毫無結果時的恐懼，和當清楚地發現終極真理的狂喜。在這兩端（面對未知的惶恐與發現真理的喜悅）之間，是長期的艱苦努力、深入思考，以及堆積如山的資料。¹⁰⁷」「質性研究之目

103 同註33，頁137。

104 海卡克(Ronald G. Haycock)著，高一中、郭家琪譯，〈加拿大軍事教育的歷史和現況〉，《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2007年），頁279。

105 同註54，頁810。

106 生活秘書，《聯合報》，2014年6月2日，版A1。

的在於發現。¹⁰⁸」說出奧提論述的「克勞塞維茲及其軍事教育」乙文之創見，是值得軍事教育重視的一個學術研究標的。

是否我們該鼓勵後學，在從事軍事學術研究中，尤其早期兵學理論思想名著，能走出與眾人不同的分析論述，闡釋這些昔日國軍極為重視的兵學教育，開啟新的軍事教學時代來臨，汲取軍事著作理論的精華，引領不落窠臼的建軍備戰方向，將國軍帶向質精衛國的鐵漢部隊，屏障家邦。正是人人能經得起「於前線承受作戰環境的意志力。¹⁰⁹」

就像1991年波灣戰爭前，赴前線作戰的美軍，官兵皆在國內類似中東的沙漠地區演習過，讓所有官兵適應當地沙漠區的天候，更強化「空地一體」新觀念的準則訓練；同時在越戰後，痛定思痛，重新調整、改革軍事院校的教育體制及課程設計，讓軍官皆能獲得較過去要來得好的教育環境。¹¹⁰經過20來年的準備與薰陶，遂在戰前不被世界各國看好的前提下，美軍勢如破竹直搗巴格達，而獲得史無前例的勝利。

勝利原因無他，是在越戰失敗後的教訓，背後的教育的改革，訓練的扎實，及重視克氏《戰爭論》的兵學教育來從事教育訓練與準備，¹¹¹才是勝利的主因。或許這也就是克勞塞維茲對兵學思想的主要觀點：「軍事教育的目的是在深入熟悉戰爭這項主題：當欲達成這項戰爭目標—追求勝利，其越能

由一種客觀形勢的科學成為一種主觀形式的技巧，就越能在本質取決於天賦而非仲裁的領域當中，證明其有效。¹¹²」落實兵學思想的教育與扎實訓練的良窳，攸關是否能落實建軍備戰的問題，達成戰爭的目標，實為現今國防建軍最主要的課題。但「軍事教育—兵學思想的教育」新觀念往往是一個不被重視的環節，致使國軍軍官兵學素養低落。這是否指出教育的投資是培養出作戰能力的最佳寫照而刻不容緩呢？

二、閱讀與寫作

何以我們要重視軍事學術研究？與其如此說，不如說革命的戰爭需不需要高深的學問呢？相信沒有人敢否認此點。雖然說，具備豐富高深的學識，不能活用，仍然無法捍衛自己的國家免遭外侵，但是可以確定一點是缺乏高深的學識基礎，做為建軍備戰的規畫依據，將無法打勝仗。

在《閱讀的歷史》書中提到，有證據顯示我們在閱讀的同時，書寫是技巧，而精熟閱讀則是能力。也就是說，書寫乃是「經過訓練而習得的技能」，而熟練閱讀則是「心靈或肉體所遺傳到的一種力量」，能夠完成技能所作不到的事情。看起來，人為的書寫技能隨著默讀的發展一同為人類帶來解放；而默讀這種潛能，其實是幾種彼此協調且仍在發展的能力之綜合。閱讀能力雖然寄生在視覺（對視障者是觸覺）上，卻以超乎純感

107 同註101，頁372。

108 同註101。

109 同註5，頁90。

110 同註6，頁151-220。

111 威廉森·莫瑞(Williamson Murray)著，黃文啟譯，《戰爭、戰略與軍事效能》（臺北：國防部，2014年），頁90-91。

112 同註7，頁52。

知的方式，瞬間就把視覺（或觸覺）連繫到思緒上。只不過，我們很少單憑視覺（或觸覺）模式來閱讀，而以多種跟語音相綜合的辦法來閱讀的。在這脈絡下，閱讀不仿取名為「超視覺」（或「超觸覺」），因為它不僅寄生，更跟有關的官能相輔相成。因此閱讀能力乃是我們真正的「第六官能」。…也就是說，當我們熟練閱讀某類文字時，就不是在看文字或聽語言，而是在整合這一連串符號所傳遞的特定意象、情緒和感覺。閱讀能力是「第六官能」，是因為它涵括了一種在文字發明之前所不曾擁有過的感受性。¹¹³這正指出知識的來源非但要從廣博的閱讀中取得，更要從書寫技能的養成，方能融會貫通以成為自己專業上的知識。

閱讀與寫作何以如此重要？《研究的藝術》書中作者說到：我們當可透過書本，參與最古老、最受人尊重的人類對話，而這個對話，數千年來就在哲學家、工程師、生物學家、歷史學家、文學評論家、語言學家、神學家等無數的研究者之間進行…。如果能善加利用此種研究對話，將能改善我們的生活層面，甚而對我們的生活，有決定性影響。¹¹⁴同時，要培養出書寫的技能養成。因為，寫作不僅可以協助我們了解研究結果。更有助於對所發現的有更好的理解，以及從中發現更寬廣的意義，進而豐富我們的思

考。¹¹⁵

馬漢《海權論》的著作思想是深受約米尼《戰爭藝術》的影響；而約米尼的《戰爭藝術》著作思想是受著遍讀兵書與研究戰史的著作引申出來。¹¹⁶為此，我們軍事教育是否在講授的同時，應該著重鼓勵學官（生）的閱讀與寫作規範的訓練呢？顯然在這塊領域是我們軍事教育有待加強的。

三、研究要領

如何來研讀《戰爭論》一書。法國社會學家、哲學家和政治評論家阿宏(Raymon Aron)就曾指出：「克氏的學說，勢將永遠曖昧不明。¹¹⁷」也就是說，若要詳盡詮釋克氏作品是困難重重，充滿挑戰。真是如此嗎？

可是學者奧提卻另闢蹊徑的認為透過「言語」的分析，發現到克勞塞維茲是很重視軍事教育觀念的，常提到Bildung（教育），但卻常為人所疏忽。這可從語言學上來觀察。根據美國維心主義哲學歷史學家凌吉爾(Fritz K. Ringer)的觀點，「Bildung（教育）是一種獨特『個體』的自我發展，一種獨特潛能由內向外的『開展』。並非『外在』『進入』學習者心中；學習者的完備是由於原本存在的『傾向』得到實踐之故。」這種過程是一種獨特整體「由內而外」的發展。¹¹⁸著重個人的品德培養，並不斷充實學識素養，企圖透過公開、有系統的觀念與資訊交

113 史提夫·羅傑·費雪(Steven Roger Fischer)著，李中文譯，《閱讀的歷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頁339-340。

114 Wayne C. Booth、Gregory G. Colomb & Joseph M. Williams著，陳美霞、徐畢卿、許甘霖等譯，《研究的藝術》（臺北：巨流，2011年），頁12。

115 同註114，頁13。

116 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著，鈕先鍾譯，《戰爭藝術》（臺北：麥田，2014年），頁22-300。

117 同註7，頁33。

118 同註7，頁33-34。

流來強化理解力。如同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I Von Preußen)指出，將級軍官有勇氣和經驗是不夠的。將領在每項事物善用判斷力；而判斷力係取決於知識。¹¹⁹ 缺乏學術素養的軍人，難以成為國之將才。這是我們在研究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過程中，必須明確了解的一個軍事學術研究——言語分析的效益。

只是開啟我進入《戰爭論》領域的導師，是鈕先鍾老師所編纂整理的《西方戰略思想史》與《戰爭論精華》，書中提到其他書籍（國內出版的讀本）所未引申的觀念。他認為要讀通此書須從以下幾個方向著手：

（一）了解其歷史背景

必須深思，否則很難了解其真意。¹²⁰ 《戰爭論》一書，從戰爭的本質說起，涵蓋著戰爭型態、戰略、作戰、戰術、政治、戰爭計畫等篇章資料，看似簡單，卻因內容是18世紀之前的戰爭論述，若不能了解彼時期的生態文化，實難以探得其真諦。為此，要能發揮勤敏於學，亦能知己百知的深思熟慮不為過。正如彼德巴芮特(Peter Paret)的觀點，他認為《戰爭論》之所以受到許多的扭曲和誤解，都是因為缺乏歷史意識，不能了解克勞塞維茲所代表的時代精神(zeitgeist)。¹²¹ 這也明確指出對《戰爭論》一知半解的

渾沌原因。

（二）精密的分析

「精密的分析」的意涵即是，分析每一件事物直到其基本因素，直到無可爭論的真理（相）為止。¹²² 透過史例的分析，我們可以找出建軍備戰的通則，可作為建軍圭臬。

就以中共研究空權的演變過程中，發現到一個事實真相：重視「攻勢空權」建立的國家，必能贏得戰爭的勝利。是因為維繫國家存亡的乃是「軍力」，毛澤東說過：「只有軍事力量發生根本變化時，才能說具備有戰略進攻的物質條件。¹²³」而當中共具有優勢攻勢軍力方能挑戰美國。繼任者鄧小平更指出，未來戰爭將是以「攻勢作戰」作為必要的防衛手段。¹²⁴ 為此，中國軍力發展是朝向「制高點的航天美夢願景發展，俾能在2010年從太空基地來支援地面作戰」。¹²⁵ 能說分析不重要嗎？

（三）整體結構思考

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對所著《法意(De l'esprit des Loix)》的導言中說欲了解《戰爭論》一書的方法是：「我要求讀者不要在頃刻之間來判斷二十年辛苦工作價值。請接受或拒絕這一本書，而非其中少數章句。假使讀者想要尋

119 同註5，頁69-70。

120 同註8，頁264。

121 同註39，頁272。

122 同註39，頁265。

123 李錦坤、劉玉珊、王貴書，《毛澤東戰略思想研究》（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2003年），頁177。

124 石名楷(Stokes)著，高一中譯，《中共戰略現代化》（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0年），頁14。

125 Ka Po Ng, *Interpreting China's Military Power: Doctrine makes readiness* (London and New York: Frankcass, 2005), p. 132；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著，高一中譯，《中共對未來安全環境的辯論》（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年），頁9。

求作者的真意，則只有從全書的結構中始能發現。¹²⁶」

國軍學術月刊中論述《孫子》兵法的學者多如過江之鯽，甚成立孫子兵學研究協會，不僅從整體來論述、分析，更套用在商業學術領域來闡釋《孫子》兵學之效益，可真是竭盡其心力來發煌其學。相對卻少有學者，來著書立言解釋《戰爭論》，讓後學能窺其堂奧。探討其失乃國軍教育不重視此類西方兵學思想之重整，來看昔日兵學思想之運用。或許這就是國軍軍事教育所面臨的問題，如何來運用現今學者賦予《戰爭論》新的風貌兵學教育，奠定官兵軍事素養，才是現今軍事教育課題首要。

(四)要掌握書中精髓去蕪存菁

以色列戰略家韓德爾(Michael Handel)認為眾人誤解克勞塞維茲的原因乃是戰爭本身已有很大的改變，然人性、政治和邏輯並無改變。但技術因素所帶來改變使克勞塞維茲的理論難以適應。¹²⁷

簡單說，克氏《戰爭論》論述是有關影響戰爭因素的人性（三位一體—人民、指揮官、政府—國家）及論述戰爭的本質邏輯意涵非常符合現今戰爭學。但因已遠離我們的生活環境的體驗，又因這是本克勞塞維茲過世前尚未整理好的書稿。又增添閱讀的困難度。及因軍事革新的科技的變革下，改變戰略、戰術之作為，或許地面防禦作戰的觀念丕變。無法再以過去防禦觀念來從事太空立體的戰爭，否則將淪為海珊巴格達兵敗如山倒的教訓。為此，研讀此書取其精髓的看

法，是很值得國軍軍事教育重視的觀念。是否國防大學應廣納學有專精的學者，按篇章研析、整理，彙整成《戰爭論》通論一書，以教育國軍將校，成為國之瑰寶。

伍、結 語

閱讀奎格瑞·甘迺迪(Gregory C. Kennedy)及凱西·尼爾森(Keith Neilson)兩位作者所編著的《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一書，方體會克勞塞維茲的軍事教育觀點：「一位指揮官有可能是一位學識淵博的歷史學者嗎？但願不是！他應該研讀歷史，在智識上專心學習，但是否對個別歷史事實了然於胸，其實並無關宏旨。」但所汲取的知識學習必須「完全被吸收內化至心智中。」更進一步指出：「知識必須轉化為能力。並要求指揮官能夠把所有的知識隨身攜帶。當心智完全與生命等化後，指揮官的知識必然轉化為真正的能力。¹²⁸」為此，他認為，對那些天生具有軍事才能的人而言，這顯非難事；即使平常人「透過省思及研究等後天教育訓練」，同樣可獲致類似的才能。因此，軍事教育中高級戰爭研究的功能，即在於「對物質及心理因素做簡明的考量，尤其在追求最高的成就時更需如此。因此，假如能讓指揮官獲得這些深刻的洞察力，且一旦內化為其思考方式，進展就會順暢而不受干擾，無論外在客觀因素為何，都無法迫使其放棄信念，則其教育目標就已經達成」。¹²⁹

必須透過教育的學習，轉化知識變成一種創新的本能，以因應戰爭的來臨，游刃

126 同註8，頁283。

127 同註39，頁272。

128 同註7，頁51。

129 同註7，頁52。

有餘的贏得勝利。二次大戰日本能輕而易舉奪下新加坡，乃是深知英軍海上正面防禦堅強，進攻不易。而柔佛省後方未設防，採避實擊虛策略，取道泰國南部登陸後，進入馬來西亞森林，由後方進攻，遂如願奪下新加坡要塞。¹³⁰ 麥克阿瑟將軍的太平洋跳島戰爭非凡構想，乃是秉持著「新方法對付眼前的新狀況」。他說：「墨守陳規，絕對打不了勝仗。¹³¹」這就是克勞塞維茲軍事教育宗旨的最佳寫照，將知識內化成一種本能的創意反映。但現今軍方少有人願意參考前賢之兵學理論觀點，對照當代戰爭事態的發展，來解說詮釋，以教育我們的後學，殊為可惜！或許這就是現今軍事教育滯礙之處；或許這就是在危機之中，我們看到了轉機發展的時刻，是可以翹首盼望與期待的。

麥卡錫(Kenneth Macksey)在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之軍事錯誤」一書中說到：「如果容許政軍領導人士勿需接觸最新發展的組織與方法，這將會發生悲慘情況，並致使錯誤因誤判而積累，演變成無法想像的可怕下場，甚至會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惡劣狀況還要糟糕」。¹³² 不鼓勵學習將會造成軍事失敗。柯恩(Eliot Cohen)與古奇(John Gooch)在《軍事失敗：剖析戰爭失敗原因》

書中亦提到：「未能學習、未能參與以及未能調適，乃是軍事失敗的根本原因」。¹³³ 指出未具備克氏軍事教育觀念的特質，將不可能贏取戰爭的勝利。這也是美軍現階段軍事教育的隱憂，在贏得波灣戰爭後，軍事教育已揚棄過去20多年來重視克氏《戰爭論》中的學說，重蹈越戰失敗覆轍不遠矣。¹³⁴ 以美軍為師，殷鑑不遠。重視克氏兵學思想教育是值得國軍軍事教育深思的核心問題。因為「軍事教育雖不是萬能的，但卻是軍事效能的必要條件。¹³⁵」

(收件：103年8月20日，接受：103年9月29日)

130 政信著，謝永湣譯，《日軍新加坡作戰之回顧》（臺北：黎明，1987年7月），頁6-28。

131 同註4，頁56-57。

132 麥卡錫(Kenneth Macksey)著，劉廣華譯，《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之軍事錯誤》（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年），頁272。

133 Volney J. Warner & Lames H. Willbanks著，趙復生譯，〈為今日與明日的校級幹部做準備〉，《國防譯粹》，第33卷第9期（2006年9月1日），頁38。

134 威廉森·莫瑞(Williamson Murray)著，黃文啟譯，《戰爭、戰略與軍事效能》（臺北：國防部，2014年），頁94。

135 Timothy K. Nenninger. "Military Educ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ew)"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7, No 4, October 2003 p. 1350. <<http://muse.jhu.edu/journals/jmh/summary/v067/67.4nenninger.html>>（檢索日期，2014年8月5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 李錦坤、劉玉珊、王貴書，2003。《毛澤東戰略思想研究》。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
- 易君博，1993。《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臺北：三民書局。
- 胡幼慧，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臺北：巨流。
- 鈕先鍾，1995。《西方戰略思想史》。臺北：麥田。
- 董文先、胡思遠，1995。《杜黑理論與空軍》。北京：軍事科學。
- 蔣緯國，1988。《軍制基本原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薛國安，2005。《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茲》。臺北：倚天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魏汝霖，1984年。《孫子今註今譯》。臺北：商務印書館。

專書譯著

- Bruce W. Watson & Peter M. Dunn 著，劉陽先譯，1987。《福島戰爭的軍事教訓》。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Eliot A. Cohen & John Gooch 著，鈕先鍾譯，1995。《軍事災難—戰爭失敗之剖析》。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James E. Mrazek 著，張銘瑛譯，1986。《打勝仗的藝術》。臺北：黎明文化。
- Jonathan Grix 著，林育珊譯，2012。《TOP研究的必修課—學術研究基礎理論》。臺北：寂天文化。

- P. Paul Heppner, Mary J. Heppner 著，王麗斐等譯，2010。《研究論文寫作：撰寫與投稿的武功秘笈》。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Wayne C. Booth、Gregory G. Colomb & Joseph M. Williams 著，陳美霞、徐畢卿、許甘霖等譯，2011。《研究的藝術》。臺北：巨流。

- 石名楷(Stokes)著。高一中譯，2000。《中共戰略現代化》。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史提夫·羅傑·費雪(Steven Roger Fischer)著，李中文譯，2009。《閱讀的歷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布萊恩·史提得(Brain Sreed)著，陳孝燮譯，2006。《武裝衝突現代戰爭的啟示》。臺北：國防部。

- 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著，高一中譯，2001。《中共對未來安全環境的辯論》。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米高·奎因·巴頓(Michael Quinn Patton)著，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質的評鑑與研究》。臺北：桂冠。

- 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著，王洽南譯，1991。《戰爭論》。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著，鈕先鍾譯，1996。《戰爭論精華》。臺北：麥田。

- 李德哈特(B.H.Liddell Hart)著，鈕先鍾譯，1981。《為何不向歷史學習》。臺北：軍事譯粹社。

- 政信著，謝永湑譯，1987。《日軍新加坡作

戰之回顧》。臺北：黎明。

哈騰朵夫 (John B. Hattendorf)著，高一中、郭家琪譯，2007。〈從歷史觀點透視軍事教育的難題〉，《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

威廉森·莫瑞(Williamson Murray)著，黃文啟譯，2014。《戰爭、戰略與軍事效能》。臺北：國防部。

查爾斯·杜希格(Charles Duhigg)著，鍾玉珏、許恬寧譯，2012。《為什麼我們這樣生活，那樣工作？》。臺北：大塊文化。

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著，鈕先鍾譯，2014。《戰爭藝術》。臺北：麥田。

海卡克(Ronald G. Haycock)著，高一中、郭家琪譯，2007。〈加拿大軍事教育的歷史和現況〉，《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

馬丁·布拉曼生(Martin Blumenson)著，譚天譯，1995。《巴頓將軍—美國的閃擊英雄》。臺北：麥田。

理查·馬里厄斯(Richard Marius) & 梅爾文·佩吉(Mil. Page)著，黃煜文譯，2010。《如何寫歷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麥卡錫(Kenneth Macksey)著，劉廣華譯，2005。《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之軍事錯誤》。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奧提(T. G. Otte)著，高一中、郭家琪譯，2007。〈克勞塞維茲及其軍事教育〉，《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

詹姆斯·鄧尼根(James F. Dunnigan) & 雷蒙·馬塞多尼亞(Raymond M. Macedonia)著，蔡仲章譯，1996。《美國的軍事革新》

。臺北：麥田。

道格拉斯·強森(Douglas V. Johnson II)著，余忠勇譯，2002。《未來的領導統御老議題及新方法》。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福煦(Ferdinand Foch)著，趙念渝等譯，1991。《作戰原則》。北京：軍事科學。

蕭瓦特(Dennis E. Showalter)著，高一中、郭家琪譯，2007。〈寧缺勿濫：談1715至1945年普魯士／德意志軍隊的軍官選拔與教育〉，《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

羅奈爾德 E. 凱斯著，林彩薇譯，2003。《教育及訓練》。臺北：國防部空軍總司令部。

蘭伯特(Andrew Lambert)著，高一中、郭家琪譯，2007。〈歷史是種過程與記錄：論皇家海軍與軍教育〉，《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

期刊譯著

Volney J. Warner & Lames H. Willbanks著，趙復生譯，2006。〈為今日與明日的校級幹部做準備〉，《國防譯粹》。第33卷第9期，頁45-56。

詹姆斯·W·小福西斯博士(Dr. James W. Forsyth Jr.) & 理查德·R·穆勒博士(Dr. Richard. Muller)。〈我們也曾經做過教務長…曾經年輕—資深教官談專業軍事教育體會〉，《空中力量雜誌》。2011年冬季刊，頁85-93。

報紙

103/6/2。〈生活秘書〉，《聯合報》，版A1。

網際網路

吳錦勳，2007/4/11。〈越寫，越聰明！〉
，《商業周刊》，第1012期，<[http://
www.businessweekly.com.tw/webarticle.
php?id=26133&p=1-8](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webarticle.php?id=26133&p=1-8)>。

外文部分

專書

Ka Po Ng, 2005. *Interpreting China's Military Power: Doctrine makes readiness*. London and New York: Frankcass.

Giulio Douhet, 1998. *The Command of the Air*. Washington, D.C.: Air Force History and Museums Program.

網際網路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7, Number 4, Oct 2003.<[http://muse.jhu.edu/journals/
jmh/summary/v067/67.4nenninger.html](http://muse.jhu.edu/journals/jmh/summary/v067/67.4nenninger.html)>

